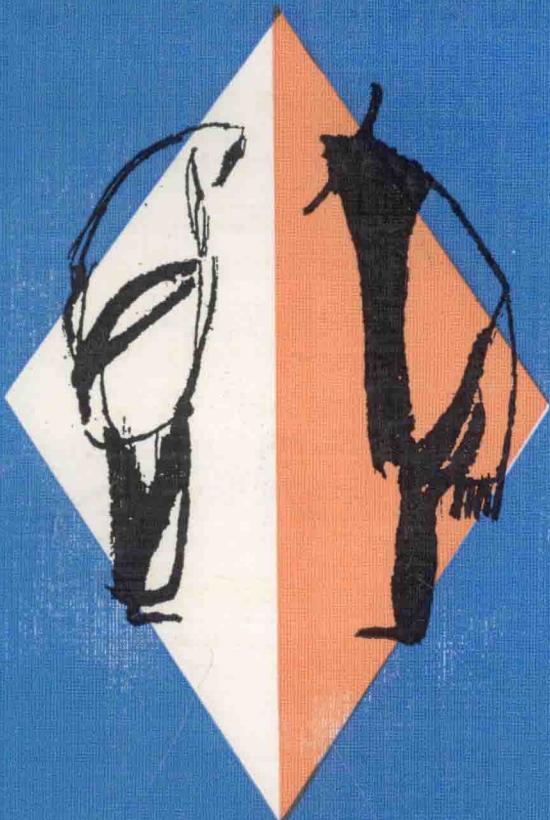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漫  
歌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江之水 林之木 译 著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 漫 歌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著 江之水 林之木 译

(滇) 新登字 01 号

Pablo Neruda,

Canto General

---

根据巴塞罗纳 SEIX BARRAL 出版社 1983 年袖珍版译出

装帧设计：张守义

作家画像：高 莽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漫 歌

(智利) 巴勃罗·聂鲁达 著

江之水 林之木 译

责任编辑：刘存沛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3 字数：430 000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222-01764-X / I · 454 定价：21.00 元

##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列)

尹承东	刘习良	刘存沛	许 铎
孙成教	孙家孟	李德明	杨仲录
沈石岩	范维信	张广森	林 光
林一安	赵振江	赵德明	施永龄



巴勃罗·聂鲁达

高莽画

## 译者简介

江之水，本名赵振江，男，生于1940年，北京市顺义县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现任该系主任、教授，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1979年至1981年曾在墨西哥学院进修，1987年至1989年应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邀请，在该校从事西文版《红楼梦》的修订和注释工作，并重译了书中的全部诗词。著作有《拉丁美洲文学史》（合著）、译著有《马丁·菲耶罗》、《拉丁美洲历代名家诗选》、《拉丁美洲抒情诗选》（合译）、《柔情》（合译）、《悲哀的咏叹调》（合译）、《血的婚礼》、《帕斯作品选》等。

林之木，本名张广森，1938年生于辽宁省盖县，1960年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0年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国文学》杂志编辑部任代理主编，1983年调新华社，现为新华社国际部译审。主要著译有，编著：《新西汉辞典》（主要定稿人）、《外国文学家大辞典》（副主编）；译作：长篇小说《合同子》、《养身地》、《帝国轶闻》和诗集《贝克凯尔抒情诗集》等。

##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 聂鲁达与《漫歌》

(代序)

义务和爱情  
是我的两只翅膀

——巴勃罗·聂鲁达

聂鲁达，多么动听而又多么熟悉的名字，然而它的译音并不准确，准确的译音应该是内鲁达；不过诗人自己却颇喜欢这个“聂”字，因为他说自己有三只耳朵，其中一只专门用来倾听大海。诗人的确有着大海一样的胸怀，大海一样的情感，大海一样的气魄，否则他是写不出像《漫歌》这样的作品的。中国读者对聂鲁达这个名字很熟悉，然而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内夫塔利·里卡尔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的人并不多。至于他为什么叫聂鲁达，按照诗人自己的说法，是为了瞒过不愿自己的儿子成为诗人的父亲，才从一本杂志上找到这个捷克人的名字的，当时他只有十四岁。

聂鲁达于 1904 年 7 月 12 日出生在智利中部的帕拉尔，

刚刚满月时母亲便与世长辞。六岁时随父亲迁到南方的小镇特木科，在那里开始上学。父亲是一名铁路的铺路司机，早出晚归，根本无暇照顾自己的儿子；幸运的是他有一位十分温柔的继母。智利南部的自然环境是严酷的，也是诱人的。连绵的雨水，无边的森林，峥嵘的山峰，汹涌的海浪，沉寂的大地，芬芳的草原，花的微笑，鸟的啼鸣，昆虫的妙趣……诸如此类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诗的种子。正如他自己所说：“那里的大自然使我如醉如痴，十岁时，我已经是个诗人了。我不写诗，但是小鸟、甲虫和石鸡卵吸引着我。”当他几乎还不会书写的时候，就为自己的继母写了一首诗，当他把自己的“作品”拿给父母看时，父亲却漫不经心地问他是“从哪里抄来的？”他十三岁时（1917.7.18）就在特木科《晨报》上发表了题为《热情与恒心》的文章。十四岁时在首都圣地亚哥的《跑与飞》杂志上发表了诗作《我的眼睛》。次年又以题为《理想小夜曲》的抒情诗获得了省级诗歌比赛的三等奖。这时少年聂鲁达的文学天赋还通过一段极富浪漫情趣的经历表现出来：为朋友代写情书。结果是美丽的布朗卡·维尔松——一位铁匠的女儿——爱上了情书的作者。这是一次无声的恋情，当时他只有十五岁。聂鲁达十九岁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晚霞》，诗中虽然不乏模拟的痕迹，但已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第二年发表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则一举成名，奠定了他在智利诗坛的地位。从此在诗歌的百花园中，辛勤耕耘，孜孜不倦，无论是在孤独的外交寓所还是在热烈的群众集会上，无论是在战斗前线还是在流亡途中，他都从未放弃过诗人的天职，直至攀上诗坛的奥林匹斯高峰。1971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聂鲁达在《海滨之花的颂歌》中写道：

我是田园诗人。

像猎手们

一样生活，

夜间，在海滨

点起篝火。

只有这花朵，

只有这海的寂寞，

还有你，像大地的玫瑰，

天真，快乐。

生活

要求我奔赴战场，

我鼓起心潮，

唤起希望：

我是全人类的兄弟，

义务和爱情

是我的两只翅膀。

.....

聂鲁达一生中创作了几十部诗集，内涵丰富，仪态万千，难以尽述，但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都是他心灵的歌。就意境而言，无论是清晰的还是朦胧的，都是他心境的写照；就文字而言，无论是优美的还是粗犷的，都是他心声的反响；就风格而言，无论是婉约的还是豪放的，都是他心情的表露。诗如其人，在他身上，诗品和人品是统一的。

聂鲁达一生的诗歌创作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17——1925年，代表作是《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他的第一部诗集虽题为《晚霞》，他自己

却犹如旭日，朝气蓬勃，天真烂漫。《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主要是献给两位姑娘的，一位叫黛莱莎·莱昂·贝蒂安斯，即有名的“黛鲁莎”，又叫“马丽索尔”即“大海与太阳”。在1920年聂鲁达在特木科荣获春光赛诗会的桂冠，黛莱莎则是春光皇后。正是这位青春少女点燃了《晚霞》中的诗篇，诗人还为她写下了十首情诗并唱了一支绝望的歌。《二十首情诗》中的另一半是献给阿尔维蒂娜·阿索卡尔·索托的，聂鲁达又称她为“马丽松布拉”，即“大海与阴影”。

“女人的身躯，  
洁白的大腿，洁白的山丘，  
你那委身的姿态宛如沃土，  
我粗野村夫的身躯将它挖掘  
并让婴儿从大地的深处跳出。”

从诗人献给她的诗句中，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对情侣热恋的激情。在聂鲁达死后，人们发现了诗人写给她的115封信。可见，这些真切动人的诗篇是从诗人的心田上长出来的，而绝非“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无病呻吟。这些诗句写得自然流畅、韵律精巧，节奏鲜明，风格喜人，将朴实无华的语言与清新隽永的意象融为一体，这是少男少女纯真的恋歌，尤其受到青年读者的喜爱。据诗人自己回忆，在《晚霞》出版后，有一次他在酒吧的舞会上遇到两个流氓打架便挺身而出，愤怒地斥责了他们。不料，当他走出酒吧时，那位彪形大汉正等着对他进行报复，聂鲁达唯一的自卫手段就是不让对方看出自己的恐惧，然而这时诗神显灵了：当那个汉子发现他是聂鲁达时，竟双手抱头，痛苦地说：

“……我是个坏蛋，跟我打架的那个人是可卡因贩子。我

们是世上最卑贱的人。可是，在我的生活中有一件东西是纯洁的，那就是我的未婚妻，我的未婚妻的爱情。堂巴勃罗，请您看看她的照片。有一天我会告诉她，您亲手拿过这张照片。这会使她感到幸福。”说着把一张少女的照片递给聂鲁达并说：“她是由于您，堂巴勃罗，是由于我们一起背诵您的诗句才爱上我的。”

第二时期是1926——1935年，代表作是《大地上的居所》。对聂鲁达来说，无论从人生道路还是从创作风格上看，这都是一个观察和思考、探索与寻求的时期。由于经济拮据，聂鲁达于1926年辍学。鉴于拉美国家有任命诗人和作家为外交官的传统，他便去外交部谋职。作为一个既无社会背景又无实践经验的初出茅庐的年轻诗人，当然不可能去什么富贵繁华之地，他被派到仰光做领事，以后又去了科伦坡、雅加达、新加坡。上任途中，他顺访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里斯本、马德里、巴黎、马赛，后来又访问了印度、中国等一些亚洲国家。在西方，这正是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拉美的极端主义和创造主义令人眼花缭乱的时期，诗人虽然也接受了它们的某些影响，但却难解困惑；在东方，则是神奇与腐朽同在，智慧和愚昧并存，诗人虽然也不乏友谊和情恋，但却充满孤独。《大地上的居所》一、二卷中的许多诗作缺乏逻辑，句式混乱、意象别致、类比新奇的原因概出于此。

第三个时期是1936——1961年，代表作是《漫歌》。这时聂鲁达如日中天，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1935年聂鲁达来到马德里，很快结识了加西亚·洛尔卡等诗人和文艺界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聚会，创办了《绿马诗刊》。西班牙内战的爆发（1936.6）打破了诗人平静的生活，血与火的洗礼使他的心灵受到了震颤，使他的情感得到了升华，使他的诗歌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第一批子弹

射穿了西班牙的六弦琴，当喷出来的不是音乐而是鲜血时，我的诗歌便像幽灵一般在人类受苦受难的街心停住，并开始沿着一股根与血的激流升腾。从那时起，我的道路与大众的道路汇合了。我顿时感到自己从孤独的南方走到了人民的北方，我愿自己卑微的诗歌化作剑和手帕，为人民揩干净沉重苦难的汗水，向他们提供一件争取面包的武器。”

这时期创作的《西班牙在我心中》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充分表现了诗人爱憎分明的激情。1939年他在自己的诗作《愤怒与痛苦》的按语中写道：“这首诗是1934年写的，从那时起发生了多少事情啊！这首诗是在西班牙写的，如今那里已是一片废墟。唉！要是用一点诗和爱就能平息世上的愤怒，该多好啊！然而却只有靠斗争和决心才能办到。世界变了，我的诗也变了。落在这些诗句上的每滴血将永远留在上面，像爱情一样不可磨灭。”从此诗人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他不再感到孤独和失望，而是把自己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除了《漫歌》之外，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还有《船长的歌》、《葡萄和风》、《遐想集》、《元素的颂歌》、《元素的新颂歌》、《颂歌第三集》、《十四行情诗一百首》、《出海与返航》、《智利的岩石》、《典礼之歌》以及自传体诗歌《黑岛纪事》等。综观这个时期的作品，题材是广泛的，风格是多样的，但“义务和爱情”始终是他的主旋律。

1961年以后，是聂鲁达诗歌创作的第四个时期。这时候，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国内斗争错综复杂，常常使诗人陷入困惑与迷惘之中，虽然他没有丧失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未来的信心，但就其诗歌创作而言，无论是抒情还是言志，都已是强弩之末，未能达到前一阶段的水平。笔者认为，这与他晚年在生活上的养尊处优和玩物丧志也不无关系。凡是参观过他的黑岛别墅的人，大概都会产生类似的联想。

这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充分的权力》、《船歌》、《沙上的房屋》、《白天的手》、《世界末日》、《还有》、《烧红的剑》等。

聂鲁达是一个多产作家，是一位名闻遐迩的诗人，云南人民出版社要我们为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翻译一部他的代表作，我们选择了《漫歌》。其实，这个名字并不完全符合原意，只是找不到更贴切的罢了。至于把它译为《诗歌总集》或《全体的歌》离原意似乎就更远了。

《漫歌》始作于 1938 年，于 1948 年完成，1950 年在墨西哥城出版，同时在智利秘密发行。后来再版时又有所扩充。无论从内容、形式还是从规模上看，它都堪称聂氏的代表作。他创作的初衷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反映拉丁美洲的历史。全书由 15 部长短不一的诗章构成，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

诗作的前六章（《大地上的灯》、《玛丘·碧丘之巅》、《征服者》、《解放者》、《背叛的沙子》、《亚美利加，我不是徒然地呼唤你的名字》）是第一部分。其中第一至第五章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个别时候，也有例外）。它反映了诗人对拉丁美洲历史的看法。《大地上的灯》向我们描述了“拉丁美洲”（当然，“在礼服和假发”到来之前，是无所谓拉丁美洲的）的自然风貌（《植物》、《兽类》、《鸟儿》、《河流》、《矿藏》和《人类》）。第二章《玛丘·碧丘之巅》可以独立成章，是全书的精华，是大史诗中的小史诗。它反映了诗人从空虚的个人主义者变成被压迫者的代言人的转变过程。这一章分为十二小节，描写坠入深渊的“我”又登上了印加帝国的古城玛丘·碧丘的顶峰。这是一次在历史中的遨游，表达了诗人对建造这座古城的无名英雄们的崇敬。玛丘·碧丘是人类向大自然挑战的象征。它是用“巨石和语言”构成的永恒的丰碑，然而它又是“由那么

多人的尸骨堆成的”。正是这座宏伟壮观的建筑将深渊与高峰、死亡与永恒融为一体。在登上玛丘·碧丘高峰之后，诗人便开始褒贬《征服者》、歌颂《解放者》，谴责《背叛者》，并在《亚美利加，我不是徒然地呼唤你的名字》中，抒发了自己与劳动群众的手足之情。

从第七到第九章是全书的第二部分。在《智利漫歌》（这是全书的原始部分）和《这土地的名字叫胡安》中，诗人表达了自己对故土的热爱和对那些默默无闻、辛勤劳作的工人和农民的敬意。第九章《让那劈木工醒来吧》同样可以独立成篇。这里的劈木工指的是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他在青年时期曾以劈栅木为生。聂鲁达认为林肯是美国民主、自由的象征。他呼唤林肯重现人间，使美洲恢复民主与自由。在这首著名的长诗中，作者将美洲大地的山川、景物人格化，并巧妙地运用历史典故，表现拉丁美洲人民渴求解放的迫切心情。

全书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第十到第十五章，记述了聂鲁达个人的经历。在第十章《逃亡者》中，诗人回顾了自己的“流亡”生涯，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独裁统治的憎恨，洋溢着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阶级感情。《普尼塔基的鲜花》反映了农民和矿工的苦难生活和英勇斗争。《歌的河》是诗人致友人米盖尔·奥特罗·席尔瓦（委内瑞拉诗人）、拉法艾尔·阿尔贝蒂（西班牙诗人）、贡萨莱斯·卡尔瓦略（阿根廷诗人）、西尔维斯特·雷乌埃尔塔斯（墨西哥作曲家）、米盖尔·埃尔南德斯（西班牙诗人）的诗篇。《献给黑暗中的祖国的新年大合唱》和《大洋》表达了诗人对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的赤子之心。全书的最后一章《我自己》与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自己之歌》异曲同工，描述了诗人的人生历程：从出生一直写到1949年2月5日——《漫歌》完成之时，其中包括诗人的家庭、童年、爱情、外交生涯的见闻、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感受……乃至

诗人的“遗嘱”。

《漫歌》是一部宏伟巨著。诗人在这部作品中倾注了全部感情、全部经验和全部理想。这是聂鲁达诗歌创作的顶峰，显示了他广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卓越的天赋。就其规模和深度而言，在拉丁美洲诗坛上是空前未有的。《漫歌》是他献给整个拉丁美洲，当然首先是献给智利的史诗。在这部庞大的诗集中，聂鲁达已经成了人类的代言人。就其本质而言，《漫歌》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作品，然而它不是政治口号的堆积，不是简单的宣传手册，而是神话与历史、政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的结合。聂鲁达不是形式主义者。对他来说，诗歌创作不是自我表现、自我雕塑、自我满足的工具，而是一种传递和表达思想信息的手段，因此，他从不过多地注意语言本身，而是始终瞄准现实，无论是主观的、客观的、个人的、社会的或者自然界的现实。他的语言不过是准确或者近似、清晰或者朦胧地表述现实的符号。通过《漫歌》，我们可以看到，聂鲁达的创作意图不仅仅是表现世界，而且要理解世界并揭示理解的过程和途径，以达到改造世界的最终目的。他作品中的“我”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实实在在的“我”，而不是抽象的、泛指的、中性的“我”。聂鲁达的诗又是美的结晶，他很注意诗的意象、节奏、词藻、句式和神韵。

聂鲁达是个既瞄准现实又富于联想的诗人，因而他的诗歌世界是多姿多彩的。当他要表现通过自己神秘、原始的视觉所观察到的日常的、自然的现实世界时，他的语言是形象的、朦胧的、模棱两可的；而当他要表现通过非个人的、客观的视觉所观察到的历史的、进化的、社会的现实世界时，他的语言则是清晰的、规范的、不容混淆的。这两种倾向在《漫歌》中交替出现，或者在一首诗中同时并存。它们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不时像互相吸引的两极一样互相

撞击，放射出耀眼的火花，这正是《漫歌》所特有的艺术魅力。应当说，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一个是虚幻的、怀古的，它将我们置于原始的、停滞的状态中，那里的一切都是可以超越的，就连“生”与“死”都是可以转化的。另一个是历史性的、展望性的、不断前进的，它将我们引向未来，那里的一切都可以充分地发展，那里的黄金时代不在起始，而在终极，在社会革命完成之日。对诗人来说，历史就像一部发动机，在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之后，将到达幸福的目的地。当聂鲁达创作《漫歌》时，他已经不再苦闷、傍徨，已经经受了生活的磨炼和斗争的洗礼，已经把个人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在谈到《玛丘·碧丘之巅》一诗的创作时，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秘鲁停下来并登上了玛丘·碧丘遗址。因为当时没有公路，我们是骑马上去的。我从高处看到石砌的古老建筑嵌在青翠的安第斯山高耸的群峰之间。激流从风雨侵蚀了千百年的城堡奔腾而下。维尔卡玛约河上的白色云雾袅袅升起。站在那岩石的脐心，我觉得自己何等的渺小，那是一个傲然耸立、荒无人烟的脐心，我不知为什么感到自己属于它。我觉得在某个遥远的时刻，我的手似乎曾在这里掘过沟堑，磨过岩石。我觉得自己属于智利，属于秘鲁，属于美洲。在这崎岖的高地，在这辉煌的、分散的废墟，我找到了继续创作诗歌的信念。《玛丘·碧丘之巅》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在《漫歌》中，这首史诗中的史诗是最引人瞩目的一章。这是一首抒情的政治诗，将聂鲁达诗歌的两种倾向、两种风格融为一炉。这既不同于《西班牙在我心中》的明朗，也不同于《大地上的居所》的晦涩。它的结构严谨，文字凝练，意境清新，视野开阔。这是对泥土与岩石的赞歌。这是对自然与人生的思考。这是一次寻根的旅行。诗人对于现代人单纯追求物质文明的悲悯，对于轰轰烈烈的战斗和牺牲的向往，都通过丰富的想象和隐喻表露出